

江淮移民与明清洮州新型民居的形成及扩散

高小强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 为了巩固西北军事重镇洮州卫的军事力量, 明朝将江淮地区民众大量迁居洮州。随着移民文化的播迁, 江淮传统民居的四合院二小楼阁建筑形制, 在本土化过程中因地制宜, 逐渐演化成洮州合院式土木结构平顶楼房形制的新型民居, 并在与各民族的互动交往中以洮州为中心不断向周边扩散, 形成颇具地域独特性且融合汉藏民族文化的甘南藏区传统民居建筑风格。

关键词 明代; 江淮移民; 洮州; 民居形制

(中图分类号) K2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6) 04-0104-06

DOI:10.15970/j.cnki.1005-8575.2016.04.013

传统民居是指按照传统方式建造并使用的具有地域或民族特征的民间居住建筑。它是人类进行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载体, 体现了不同民族的人群在不同地域环境中适应和利用自然环境的能力, 也是人们民俗、审美等地域文化的物质载体。甘南藏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边缘向黄土高原和陇南山地的过渡地带, 此地先民经历了由逐水草而居的单一游牧生活逐渐向以草原山地游牧、江河流域半农半牧、山间平缓地区农业生产为主的多样化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与此相应, 传统民居也出现了帐房、窝棚、碉房、木板房、“马康”^①、土木平顶楼房、“马康”和土木二层平顶楼房相组合等多种形制并存的建筑形制。

关于甘南藏区传统民居的研究, 学界主要从民居的环境、类型、特点、功用及建筑艺术等方面进行了论述,^②但对其形成的原因及其分布区

域的扩散探讨不多, 尤其是关于移民文化对于当地民居形制变化的影响关注不够。本文拟从移民文化及其与藏区文化融合的角度, 探讨甘南藏区新型民居样式的形成与扩散, 试图对该地区的传统民居样式的历史源流进行探讨。不当之处, 敬请方家匡正。

一、明代以前甘南藏区的传统民居形制

新石器时代, 今甘南藏区民居已经雏形初见, “房屋建筑, 有半地穴的, 有地面建筑, 有单室和双室, 屋内有圆形小灶等”。^[1]秦汉时期, 甘南为西羌民族主要活动区域, 羌民“所居无常, 依随水草, 地少五谷, 以产牧为业, 其俗氏族无定, 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2]魏晋南北朝时期, 吐谷浑“多畜, 逐水草, 无城郭。后稍

(收稿日期) 2016—04—12

(作者简介) 高小强 (1980—), 男, 甘肃静宁人,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西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基金项目)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西北地区历史文化村镇社区功能提升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项目编号: 2013BAJ10B08)的阶段成果。

^① “马康”, “主房”, 是人们进行主要活动的场所。

^② 任致远《甘肃藏居》, 《建筑学》1983年第7期; 王一清《甘南民居》,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贡布《甘南藏族民居特色》,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桑吉才让《甘南藏族民居建筑述略》,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傅千吉《白龙江流域藏族传统建筑文化特点研究》, 《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 安玉源、王晨《甘南藏族传统民居的生态适应性》, 《兰州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37卷; 张毅《拉卜楞藏区民居形成的变迁》: 《甘南日报》2007年5月9日, 第3版; 丹曲《安多地区藏族文化艺术》, 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7年; 齐琳《甘南藏族民居地域适应性研究》,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9年; 唐晓军《甘肃古代民居建筑与居住文化研究》,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2年。

为宫屋，而人民犹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3]吐谷浑社会虽然逐渐开始营造城池和宫殿，但“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以肉酪为粮”。^[4]隋时期，党项“牧养犛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穡”，“织犛牛尾及犛牛毛以为屋”。^[5]游牧生活方式下，帐幕为其主要的民居形制。

比至唐代，吐蕃“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颇有城郭。其国都城号为逻些城。屋皆平头，高者至数十尺。贵人处于大毡帐，名为拂庐”。^[6]高者数十尺的平头屋即碉房，拂庐即羊毛编织的大帐篷。碉房更多地体现了军事防御作用，这种“外不见木，内不见石”的碉房，在甘南藏区除寺院建筑中有所保留外，传统民居中已不多见。两宋时期，唃廝囉“居板屋，富姓以毡为幕”。^[7]板屋作为一种传统民居形制，至今在甘南卓尼、迭部等地继续沿用。元时期，甘南藏区归宣政院管辖，属吐蕃等处宣慰使司统领。为了解决草场不足，开始发展农业，“些地”（卓尼杨土司祖先）部落在元朝中晚期进入洮州境内的卓尼高达坡定居，用松枝搭成窝棚，拓荒种地，经营农业。后来土司每年除夕都要在衙门大堂前搭一松棚以纪念先辈创业时的艰难。^[8]窝棚式居住方式，使以游牧为主的部民开始定居，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游牧式生活方式向定居生活的转变。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明代以前甘南藏区的传统民居以帐房、碉房、木板房及窝棚等为主。帐幕具有结构简易、便于移动等特点；用材更多地使用牛羊毛粗布；占有较少牲畜的普通牧民大多以木板为主；而以石材为主料的碉房建筑除经济实用外，还具有很强的军事功能。

二、明代江淮移民与洮州 新型民居的产生

明洪武四年（1371），甘青藏区各部陆续归附明王朝。据《明史·西域传》记载：

（洪武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等叛，据纳麟七站之地。命征西将军沐英等讨之，又命李文忠往筹军事。英等至洮州旧城，寇遁去，追斩其魁数人，尽获畜产。遂于东笼山南川度

地筑城置戍，遣使来奏。帝报曰“洮州，西番门户，筑城戍守，扼其咽喉。”遂置洮州卫。^[9]

洮州卫隶属陕西都司，治今甘肃省临潭县新城镇，辖境约甘肃省岷县以西及西倾山以东的洮河流域，包括今临潭、卓尼、碌曲、迭部、合作市全境及夏河县、玛曲县、舟曲县部分地区，略同于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10]

为加强管理，明政府下令迁出洮州土著人口而以岷洮陕西等处官军驻扎，据明太祖谕曹国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敕载：

其洮、铁二城、长阳地方人民，切不可留一户在彼。……毋得私己容留一人在于洮州地方，后为民患。彼中人多养马匹，务要收拾干净，不可令人作弊……洮州不守，恐久远难为转运。……必须守御，其地方人民，一户也不要留在那里，如今守洮州，就将所得牛羊，多拨些与军，折作二年军粮也。^[11]

明政府迁出洮州城及周围地方土著居民，将所得牛羊作为戍边军粮。洮州卫驻扎“官军原额马步五千六百二十二员名，新旧召选舍人士兵民夫八百名”，^[12]大量移民进入洮州地区，安家落户，重建家园。随着官军的驻防和明王朝对洮州的经略，该区域以畜牧占绝对优势的生产方式逐渐开始改变，农业生产方式逐渐扩散。为了保证屯垦，明太祖“命天下卫所军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守城，务尽力开垦，以足军粮”。^[13]出于稳定军心及移民实边的需要，“明代的统治者不只许军士携妻小在卫，也允许携带父母兄弟在卫随住”。^[14]卫所戍卒及家属一起戍边屯垦，居民大多聚居在城内或附近的堡寨之中，这使军士有所“牵挂”和“拖累”，不会轻易逃亡，从而达到固守疆土的目的。而当时的移民中以江淮官员为主体，并由世袭而数代为官。所属士兵大部分来自江淮地区，增加了官兵相互之间的亲近感，在洮州新的地理空间中产生了心理上的归属感，战时能够听从调遣，平时乐于耕种，其后裔在洮州世代繁衍生息，渐成土著。“予因是求各家谱牒览之……其最著之族有二：一金

氏，都督金朝兴两弟之后也；一李氏，都督金事李达之后也。……其他所见家谱，有宋氏，原籍徐州屯头村，明指挥金事宋忠之后。有杨氏，原籍南京经丝巷，明镇抚千户杨遇春之后。有刘氏，原籍六安州，明百户刘贵之后，有范式，原籍合肥，明千户范应宗之后”。^[15]由此可知，此地居民多为明初自苏、皖等地迁来者。

毋庸置疑，人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没有特定人群承载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化。文化扩散是指文化从一地扩散到另一地的空间过程。文化事项的扩散是由于初始承载者人口迁移造成的。^[16]移民从江淮地区迁移到“无人居住”的洮州，两地风俗相差甚远，加之与当地少数民族隶属于不同的管辖体系，所以相互接触和交流少，文化渗透相对缓慢。由于迁移人口众多，自我文化认同感强烈，祖居地的风俗习惯自然而然被移民带入洮州，其建筑房屋也保留了家乡江淮地区的民居风格。

江淮民居的总体布局，以天井为中心，由回廊、平面组成“口”字型的四合院二层小楼阁。据学者研究表明，明代以前，以木质梁架承重，外加砖、石、木、土砌筑的围护墙。建筑以木构架楼居为主，梁架结构混合采用北方抬梁式和南方穿斗式两种结构，居民的活动主要在二楼，一层和二层的层高比为1:2；到了清代，徽居基本上接受了北京四合院主要活动在一层的习惯，层高比为2:1。格栅窗应用极为普遍，精工细作的木雕窗棂，题材极为丰富。^[17]无独有偶，甘南藏区的传统民居中也有类似的建筑样式。这是江淮移民将家乡的传统的居住方式带到洮州，使洮州地区出现了以木结构的二层楼房为主的新型民居。

当然，江淮民居文化到洮州后受当地环境条件的影响，在局部也发生一定的改变。江淮特色的“青瓦粉墙”已经不再出现，这主要是受当地材料的限制。由于“拉卜楞附近不产砖瓦，寺院内部墙壁用砖砌成者殊少，喇嘛及人民住宅则以黄土为主”。^[18]以板筑土墙代用砖，楼房屋顶用泥土做成平顶或做成人字型屋顶在上覆以木板。洮州地区降雨量相对较多，但屋顶基本不用

瓦，主要是由于这一带瓦比较稀缺的原因。

“岷州木易而陶难，故公署寺观以及富人之室，栋梁极伟，斗拱巍然。屏窗栏槛之属，厥制甚备，下用丈余松板，满室平铺，不少惜焉！且有以合抱大木剖其中而为檐溜者。上用陶瓦覆屋，四壁则不尽用砖，多砌以土坯，外涂坚茨而已。其在寻常百姓所居，规模颇不甚隘，窗棂阁板亦复整备，兼多楼房。惟是覆屋止用松板，以乱石镇之，遂毕营室之事。一二年间，必重加修整，否则床头风雨，所时有也。诗云‘在其板屋，乱我心曲！’其是之谓欤！”^[19]

由此可见，当地建房多砌以土坯，瓦只能用于公署寺观以及富人之室，靠近林区的普通人家用松板代替瓦，为防止风吹翻松板，在松板上压上石头。至今，甘南卓尼、迭部、舟曲等靠近林区的地区还有这种沓板房。远离林区的地区，则用泥土做成土平顶。除此之外，江淮移民借鉴了碉房的平顶建筑形制，对合院式土木结构楼居二层的建筑布局做了适当的调整，房屋空间布局以曲尺形和凹形为主，主要是为了便于采光，增加受热面积，以适应高原气候。一般坐北朝南，二层部分的建筑后移，前面留有晒台，楼上住人，楼下层饲养牲畜和堆放农具。据民国学者的调查，洮州农村房屋建筑与南京亦有相似之处。^①

由此可知，土木结构二层楼房的甘南藏区传统民居是江淮居民迁徙扩散到洮州后，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结果。有学者也认为“寓兵于屯丁，实为简而有效之法，屯丁中尤以凤阳人为最多，今临潭新城以下汉人装饰，故仍不失明代安徽遗风（如女子服饰用高髻凤鞋——鞋尖甚细而向上，而房屋之布置与形式，颇有江南古风……）”。^[20]当然，随着大量江淮人迁移并定居于洮州地区，成为洮州地区的新居民，自然而然地也带来了江淮地区的民居建筑形制，在历经五个多世纪的沧桑后，形制遗风仍然被保留了下来。

明政府在经济方面除移民屯田，建设洮州之外，还以茶马互市为纽带，开展民族贸易，以互通有无，促进洮州商业的发展。在政治上实行“土司”、“僧纲”制度，达到“以土治土”的目的，通过“土流参治”以维护明王朝

^① 陆俊光. 洮州农村 [J]. 服务月刊. 1941 (5-6): 123. “房屋多是两层，下边养牲畜，上面住人，只北房一幢，间亦有东房者甚少，天井无由构成。此与南京附近农村房舍相仿佛，或为他们祖先带过来，亦正有因。因为江宁县农村是我工作过的，故知其详。”

的长治久安。在教育方面，兴办学校，传播文化。在明政府的多方努力下，在甘南藏区出现了“创墩台，瞭望处处农猎，开卫学，教化家家诗书”^[21]的文明开化现象。无疑，在甘南藏区，江淮移民文化以洮州为中心向周围扩展扩散。“洮邑鄙在西陲，宋元而上，莽为寇区，明初设卫置戍，安插汉民，邑治渐彬彬矣”。^[22]通过移民的嵌入和文化的传播，一改明以前洮州地区的蒙昧状况。随着移民屯垦区域的不断扩大，移民和周边游牧民族有了交流，双方习俗也慢慢开始互相渗透。

移民社会的本土化和边疆地区的内地化是统一的进程，当内地的物质和文化传播到甘南藏区后，和本地的游牧文化产生碰撞，二者相互吸收和借鉴，实现了文化的互融，形成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

三、清代洮州民居在甘南藏区的扩散

清乾隆十三年（1748），改洮州卫为洮州厅，治所仍在临潭新城，领辖今临潭、卓尼、碌曲、迭部等县，归巩昌府（治所今甘肃省陇西县）管辖。据《洮州厅志》载：洮州城内一十八坊。城外村庄堡寨，以洮州城为中心分布，各庄各村分布在各路。

据笔者统计：

东路 51 个村庄，离城半里至七十五里；
南路 33 个村庄；离城一里至六十里；
西路 45 个村庄，离城半里至七十八里；
北路 55 个村庄，离城三里至一百八十里；
东南路 21 个村庄，离城十里至六十里；
东北路 10 个村庄，离城十里至三十五里；
西南路 12 个村庄，离城五里至四十里；
西北路 5 个村庄，离城半里至五里。
共计 232 个村庄堡寨。^[23]

随着村庄规模扩大和数量的增加，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空间距离越来越小，相互之间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距离衰减作用，对任何均质的空间，只要某一物质或事物先占据了某一位置，空间就被异化了。对这一物体或事物越接近受他的影响就越大”。^[24]在同一自然环境下，由于地域范围相关联，加之移民所代表文化的国家背景，江淮文化势必扩散到周边地域，形成文

化上相似的群体。尤其是村庄附近游牧民族受农耕文化的熏陶和影响，生产生活方式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改变，“内地番人颇染汉风，其俗务稼穡、习工作，事畜牧，高楼暖炕，皆与汉无异。但多居楼下，而楼之上则堆积柴草焉。食尚乳酪，衣惟褐裘，春冬不易”。^{[25] (P.928)}在农耕文化的影响下，靠近农区的游牧民族慢慢开始定居农耕，民居采用了土木二层结构楼房的建筑形式，但饮食、服饰仍保留了其原来的习俗。

游牧民族虽然学习汉族建造楼房，但多居楼下，究其原因主要是以前居帐篷或窝棚，不习惯住楼上；二是虽然定居农耕，但畜牧为主业，牛羊数量多，有专门的牧场。而少部分以农业为主的少数民族，则住二楼，一楼养牲畜。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受少数民族的民族心理与生活习惯的影响。“近藏俗称熟番，又称‘龙娃’，近城中通汉语，半耕半牧，渐成熟地，居土屋，有力者亦居板屋，高楼暖炕，仓储充盈，惟服饰仍存藏俗。洮河上流临潭县卓尼附近之藏民，即属此类”。^{[26] (P.62)}

随着彼此沟通交流的深入，再加之土木结构二层楼房对半农半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很强的地域适应性，在以洮州为中心的甘南藏区扩展扩散，遂出现“深院高楼平顶房，碉楼座座满村庄，父老侈喧谈自卫，纷飞顽石当刀枪”^[27]的乡村状貌。这里的碉楼就是土木结构的二层平顶楼房。而今，新城城区东街、南街、西街、北街的临街尚有保护完好的明、清时期的建筑，房屋多为土木结构二层建筑，镂空木刻、小格窗户等体现了江淮建筑的遗风。

距离中心区较远的少数民族，受自然环境和文化交流的影响，两地间的相互作用微弱，依然以游牧业为主，“至外地生番，则毳幕轻迁，野性难驯，少耕稼……游牧迁徙，逐水草而居。牛马羊无数，皆以山谷量”。^{[25] (P.930-931)}其居住形式依然以帐篷为主。“远藏俗称生户，即纯粹游牧民族，不通汉语，不受影响，插帐迁移，不知庄稼，其帐房多为黑色状，如覆斗，称为黑帐房（蒙古包称为白帐房）”。^{[26] (P.41)}他们保留了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其居住生活“并不是散漫零落，而是聚居在一起的，各家的帐房都住扎在同一地带，当一地的草被食尽以后，再选定日子，在‘郭哇’领导之下，全部落的居民，一

齐拔帐迁移。在相隔一二日路程以外草料丰茂的地方，靠水立帐，又住了下来，各部落每年迁移十次左右，平均月余迁移一次”。^[28] 仍然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牧民为了适应恶劣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扩展生产方式，在半地穴窝棚的基础上建造“马康”式住宅，这是一种半地穴、外形如碉堡的土木结构平顶屋。^[29] 拉卜楞寺周边半农半牧区的“马康”式民居始于明末清初。^[30] 有学者认为“安多藏族地区，随着半农半牧业的发展，家庭成员从事农业人数增多，改善居住条件的意识增强，对原来的‘马康’进行改进，发展成为二层平顶楼房。平顶楼房约产生于清代中叶，流行于清末民初，此说尚待考证。”^[31]

笔者认为，甘南藏区的二层平顶楼房应为明初以洮州为中心的江淮移民文化扩散的结果。在移民文化的影响下，牧区向半农半牧区转变的过程中，部分游牧民族参照了洮州的二层楼房，将其发展成为半地穴土木结构二层平顶楼，即紧贴“马康”续建了二层平顶楼房，这是游牧民族在保留自己特有建筑“马康”形制的基础上，吸收了汉族建筑文化而形成的别具特色的依附式的新型民居建筑形制。“续建平顶楼房的时间大约开始于清中叶，流行于清末至民国时期”。^[32] 如果按“马康”和平顶楼房起源的时间推测，笔者以为紧贴“马康”而续建二层平顶楼房的时间应

该至少是在明末清初。至今这种传统民居在甘南半农半牧区仍然流行。

四、结语

传统民居建筑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诸要素复杂作用的结果。“地表的差异性不仅来源于自然界，人类活动会对地球表面的差异性做出反应，可以自生差异性，或加强或减轻源于自然界的差异”。^[24] 由于不同阶段自然环境、经济形态、文化认同、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人类通过不断调适及创造，建造了不同风格的民居建筑。甘南藏区传统民居经历了帐篷、碉房、木板房、窝棚、土木平顶楼、“马康”、“马康”和土木平顶楼房的组合等建筑形制的演变，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

每一种传统民居建筑形制都是特定文化的展现，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人群在应对不同气候、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时选择了既有继承性又有创造性的民居建筑，导致同一地理区域民居的发展呈现出可传承性和多样性，江淮移民通过文化的迁移扩散带来了江淮式民居，结合洮州当地环境，对甘南藏区民居的发展影响至为深远，出现了土木结构平顶楼房，“马康”与土木平顶楼房依附式的组合建筑形制，形成了今天甘南藏区民居的独特性和多样性的建筑风格，民居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独特性、多元性的魅力。

(参考文献)

- (1) 李振翼. 甘南简史 [Z].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南藏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甘南文史资料 (第五辑), 1986: 10.
- (2) 后汉书. 西羌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869.
- (3) 南齐书. 河南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1026.
- (4) 晋书. 吐谷浑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537.
- (5) 隋书. 党项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1845.
- (6) 旧唐书. 吐蕃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5220.
- (7) 宋史. 吐蕃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4163.
- (8) 杨士宏. 卓尼杨土司传略 [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0: 18.
- (9) 明史. 西域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8540.
- (10) 张彦笃, 包永昌等修, 张俊立校注. 洮州厅志校注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 3.
- (11) 明太祖御制文集. [M]. 谕曹国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敕. 台湾学生书局, 1965: 299-302.
- (12) (明) 张雨. 边政考. [M]. 西北文献丛书编委会: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 78 册, 兰州古籍书店, 1990: 371.
- (13)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明太祖实录 (洪武二十五年二月庚辰·卷216) [M]. 中华书局, 1962:

3184.

- (14) 王毓铨. 明代的军屯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44.
- (15) 顾颉刚. 浪口村随笔 [M]. 临潭居民祖籍.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232.
- (16) 周尚意, 孔翔, 朱竝. 文化地理学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177.
- (17) 赵新良. 诗意栖居. 中国传统民居的文化解读 (第一卷)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68 - 74.
- (18) 张其昀. 甘肃省夏河县志 [M]. 之四矿产. 台湾: 成文出版社, 1970: 62.
- (19) 岷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岷州志校注 (内部发行) [M]. 岷县: 岷县印刷厂印刷, 1988: 185.
- (20) 王志文. 甘肃西南部边区考察记 [A]. 中国西北地方文献丛书·西北民俗文献丛书(第19卷) [C]. 兰州: 兰州古籍书店, 1990: 309.
- (21) [清] 张彦笃修, 包永昌等纂. 洮州厅志 [M]. 李都督墓志. 台湾成文出版社, 1970: 798 - 799.
- (22) [清] 张彦笃修, 包永昌等纂. 洮州厅志 [M]. 选举. 台湾成文出版社, 1970: 583 - 584.
- (23) [清] 张彦笃修, 包永昌等纂. 洮州厅志 [M]. 都堡. 台湾成文出版社, 1970: 139 - 168.
- (24) 梁进社. 地理学的十四大原理 [J]. 地理科学, 2009, (3).
- (25) [清] 张彦笃修, 包永昌等纂. 洮州厅志 [M]. 番俗附. 台湾: 成文出版社, 1970.
- (26) 张其昀. 甘肃省夏河县志 [M]. 之三民族. 台湾: 成文出版社, 1970.
- (27) 陆泰安. 洮州纪略 [J]. 西北通讯, 1947 (6): 21.
- (28) 俞湘文. 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7: 28.
- (29) 唐晓军. 甘肃古代民居建筑与居住文化研究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2: 349.
- (30) 伦珠汪姆, 昂巴. 神性与诗意: 拉卜楞民俗审美文化研究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 78.
- (31) 丹曲. 安多地区藏族文化艺术 [M].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7: 283.
- (32) 张毅. 拉卜楞藏区民居形成的变迁 [N]. 甘南日报, 2007 - 05 - 09 (3).

Immigration of Jianghuai Area and the Formation and Diffusion of New Dwellings in Taozhou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AO Xiao-qiang

(Institute of Northwest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 Economic Develop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Abstract] To consolidate the military strength of Taozhou, an important military town in the Northwest, the rulers of the Ming Dynasty ordered a large number of immigrants from Jianghuai Area to settle down in Taozhou. With the spread of immigrant culture, the architectural form of the traditional dwellings of quadrangle with two-storey tower in Jianghuai Area gradually evolved into the new dwellings of Taozhou-typed courtyard of earth with two-storey flat-topped buildings by adjusting to local conditions in its localization. In the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ethnic groups, this architectural style constantly expanded to the surrounding areas and formed a uniqu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style with both regional features of Gannan and integrated features of Chinese and Tibetan cultures.

[Key words] the Ming Dynasty; immigrations of Jianghuai Area; Taozhou; architectural form of dwelling

(责任编辑 李 劼)